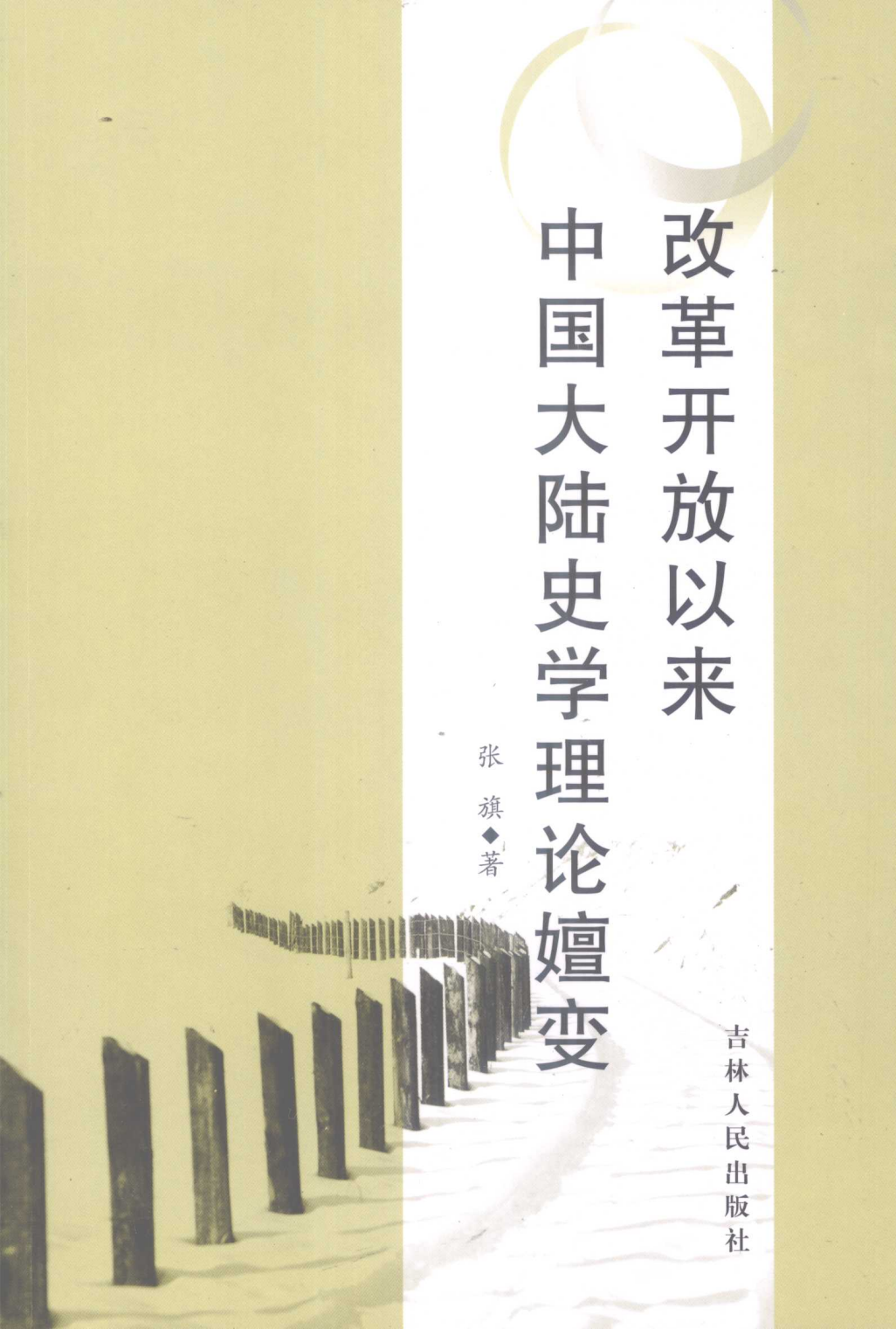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大陆史学理论嬗变

张旗◆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 史学理论嬗变

张 旗 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史学理论嬗变/张旗著.

—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7.12

ISBN 978-7-206-05505-8

I.改… II.张… III.史学理论—研究—中国—现代

IV.K09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97100 号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史学理论嬗变

著 者:张 旗

责任编辑:谷艳秋

封面设计:创意广告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发行(长春市人民大街 7548 号 邮政编码:130022)

印 刷:长春永恒印业有限公司

开 本:850mm×1168mm 1/32

印 张:8 字数:200 千字

标准书号:ISBN 978-7-206-05505-8

版 次:2007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200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3 000 册 定 价:2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江苏省“十五”社科规划项目
扬州大学出版基金资助出版

前 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史学出现了学术转型。这种学术转型，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从应用层面看，学术研究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为以现代化建设为中心，做到与时俱进；从学科形态看，要实现由传统形态的史学向现代形态的史学的转变。

本书研究的目的是从史学理论的角度，把改革开放以来的史学作为完整的对象进行系统研究、试图建立以学术为中心的研究框架、试图勾勒当代史学研究的一般形态、试图在传统的史学思想史中加入社会学的角度，把思想与制度结合起来。本书研究的创新与意义也主要体现在这些方面。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史学理论的嬗变和社会背景的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那些与学术转型有关的史学外部的各种社会因素也同样在本书的视野中。实践基础地位的逐步回归、现代化道路的中国立场、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阶层的分化所导致的思想观念的变化，都是重点探讨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的史学理论嬗变，专注于史学转型本身的具体表现及内在理路。对改革开放以来史学嬗变的特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再认识和新发展、西方史学的东渐、史学领域内多元观念的催发、史学意识的萌芽都有专题理论探讨。这是本书的重点。

需要特别强调内容的有：

史学理论嬗变的起点和目标。改革开放初期的史学是史学理论嬗变的起点。对它的认识不能只局限在文革的视野，特别是批

判的视野里。从学术转型的角度来认识史学的传统形态也是极为必要的。史学理论嬗变的目标是史学的现代化，主要包括三方面：其一是学科结构的调整，这种调整在提高那些应用性文科的地位的同时，大大削减了史学可以支配的社会资源，从而使史学陷入持久的社会冷感之中。在学科危机的呼声中，史学工作者逐步完成自身心态的转换，从而使史学从不正常的政治尊威向学术本位回归，并由此萌发了群体性的学科意识——史学意识。其二是史学自身的学科理论和研究体制的建设，规范史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防止非学术因素对史学研究的任意渗透。这种建设将有助于史学在政治之外发现自我的另一种存在方式，从而使研究超越当代的政治意义，自觉顺应学术史发展的潮流。其三是与国际史学接轨。在与国际接轨的过程中，中国的史学工作者将逐渐学会用世界通用的形式来表现中国历史的特质；同时封闭的、意识形态化的学术评价体制将进一步被打破，史学学科理论的基础地位将进一步巩固。改革开放以来的史学现代化主要集中在前两个部分，与国际史学的接轨则是未来中国史学努力实现的一个目标。

一个关键词：史学意识。所谓史学意识就是学科自觉，是指从事历史研究的史学工作者对自己工作的特点、对自己独特的学科特征、学术史意义、社会地位及未来的发展趋向都有自知之明和成熟稳定的认识。强调史学意识就是强调史学在社会转型和文化转型中的自主能力，从而取得适应新社会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史学意识的形成是多元观念的产物。当史学可以在传统政治模式的控制中获得一点自我生存的空间，去接触政治以外的世界，它就有机会对多种外在的参照系进行比较，在不同的外界刺激中开始发现自己的存在，思考自己的问题，并形成自己的立场，为自己在这个文化日益多元共存的社会中重新确立位置。改革开放以来的史学意识体现在对史学自身的关注，以及对

自主立场的争取。本书所论述的一切都与之相关。尤其以史学为中心的研究视角、在社会转型的背景中审视史学理论嬗变的现实意识将时时提醒笔者警惕“维护”、“批判”对“研究”的僭越、“单一”对“多元”遮蔽。相应的史学如何在新时期、新形势下重新定位自己的内部和外部关系将是本书持续讨论的一个重要问题。

对一种基本关系——历史与现实——的阐释。史学应该怎样与现实联系。无论是严肃的研究领域还是通俗的大众世界，都被置于同一个时代环境中，这个大环境所孕育的时代风貌是学术与民众得以密切联系的基本前提。人文学术得以安身立命的意义在于它的人文关怀、它的社会性。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定位要以此为基本出发点，从而构建自己独特的学科体系。人文学术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要在永恒的人文意义与特定的时代之间架起桥梁，对那些具有永恒意义的命题不断做出独特的解释。这种解释所具有的时代色彩，首先归功于社会大众的集体创造，其次归功于人文学者能够及时而准确地触摸大众心中那些已还处于朦胧状态的精神脉搏，并能系统地表达出来。人文学术的前瞻性和社会意义由此而出。史学与社会现实的联系，其着眼点主要应该放在与这种精神脉搏的共振上，而不仅仅是朝上看，把政府的政策导向作为社会现实的全部。由于改革开放以来的史学一时无法全面突破传统的资政模式，因此在史学研究重心的转移上更注意党政大事方面，比如从阶级斗争转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学术研究重心转变的重点。而对史学研究模式的现代化问题则较少关注。比较明显的表现有两方面，其一在研究课题的选择方面倡导紧密挂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历史与现实、史学的学术价值与社会价值等关系的讨论中这是一种主导性的意见，另外《光明日报》史林版的一些文章经常发表这种意见。受这种主导性意见的影响，史学研究的课题很少有以社会底层为对象的。以致国外的一

些学者发出人民的史学家为什么不研究人民的历史的疑问。20世纪80年代在讨论史学传统时，一些学者对资政传统提出质疑，但是声音很微弱，主导意见对资政传统还是维护的。最近的新变化是通过展望的形式对史学的资政传统进行突破，并被权威学术期刊所接受。其二是用行政方式来运作学术研究，由于在制度上缺失了专业的支撑，对学术成果的评价缺少足够的学术内涵，为形式主义的乘虚而入变相提供了机会。这种状况在改革开放以来相当长的时间内没有得到改变。直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在学术规范与学风建设的大讨论中，学术界对建立符合学术研究特点的学术机制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达成广泛的共识。在实际操作层面实践这种共识正被提上议事日程。

一条学科理论建设的线索。它已为众多史学工作者勾勒出来，那就是从哲学理论与学科理论的区分发展为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的区分，再深化为历史意识与史学意识的区分，这是一个史学自我认识逐步深化的过程。从以前统一和联系的角度转变为区分的角度，是史学理论发展的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变化。这种区分厘清史学内部和外部的各种关系，明晰理论层次。对各种层次的理论的适用范围都将有所规定，使各种研究的性质不至于界限过于模糊。这既有助于形成符合史学自身发展特点的研究规范，也有助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比如当马克思主义理论过度僭越史学学科理论的空间时，学科理论建设过程中出现的风险就会由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承担。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先进性的证明，难度也随之增加。马克思主义理论先进性和史学研究的落后之间的矛盾就是一个摆在眼前的问题。但是如果从区分的角度来看，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先进性和史学学科理论的落后性就不是一回事。马克思主义理论可以致力于总结来自学科理论的实践，而学科理论也更为自由地发展自己。

当代史学的传统形态。对传统史学合理批判和继承的工作随

着封建史学的实体的消解和资产阶级史学的兴起，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被忽略掉了。改革开放以来，史学现代化的重要性日益凸现，史学的传统形态是一个需要重新认识的问题，对它的研究应透过那些表面的形式走进它的深处——思维与意识。史学传统形态的这种深层表现有：

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比如，强调史学的自主性容易受到一种误解：史学的自主性将削弱史学与社会现实的联系。这种误解既起源于非此即彼的思维的影响，也受到传统的史学资政观的局限。在多元观念中强调史学的自主性并不等于史学与社会现代的断裂。正如上文所述。史学的自主性导致它与社会现实的联系变得全面。它对国家大事的关注度可能会有所减弱，但是它对民间社会的关注度却在增加。这种变化可以让史学更恰当地处理它的内外关系。不至于在强调某种社会联系的同时，淡化了其他的社会联系。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史学研究的关系演变中已经反映出这种变化。比如，史学研究格局由排他性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嬗变为“一元多线”、“一导多元”。

教条主义。教条主义不是我们解释史学现象的终极原因，而是需要我们进一步的研究重要史学现象。本书认为，教条主义的传统和中国传统史学政学不分的传统有着密切的关系。政治的一个重要传统和特点是保证路线方针的一致性和连续性。身在政界，需要不断地就一些重要事情表明立场，对基本路线、方针、政策反复说明和不断强调。这种传统对传统史学产生深远的影响，传统史学的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注释和宣扬名教。学者的个人观点的表达和发挥必须在名教的语境中展开，否则就是离经叛道。由此形成的唯经、唯书传统就成为当代教条主义存在的一个重要基础。形成教条主义的另外一个重要基础是学者的惧祸心理。历史上由于学术研究触犯政治忌讳而有杀身之祸的个案真是罄竹难书。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文革梦魇已被改革的春风所驱

逐，政府不断强调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一再重申双百方针，积极营造宽松的学术研究氛围。但是由于积伤难愈，惧祸心理仍幽灵般游走于许多史学工作者的心中。从稳妥的角度来看，实事求是地依据史实，固然有所创见，但可褒亦可贬。仅仅一个“慎重”当头，就让人很有压力。而头顶着“马克思主义”的大伞，纵然乏新可陈，却也没有犯祸之忧。相对于前者，这是个保险的研究方式。这种“惧祸”心态长久地挥之不去，助长了教条主义的风气，对史学研究的现代化是个很大的障碍。

内在超越。在史学领域内的表现是：（1）重视成就，反感批评。做学问与做人是一体的。所谓道德文章一直是学人的理想境界。因此一些史学工作者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史学成就总结的热情要远远大于对存在问题的反思，史学批评难以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和内在超越的史学传统有密切的关系。（2）“非过失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区别了原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操作方式。对建国以来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失误时，认为是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与运用存在问题，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存在问题。对“史学危机”的认识存在着“危机”和“转机”两种主要观点。“转机”说是当时的主流观点，也说明了内在超越传统的强大。

对史学的传统形态的评论不能采用肯定或否定一切的简单做法。因为这不仅是认识问题，也是实践问题。史学的这种深层次的传统形态的命运与前途，将取决于史学的现代化进程和史学工作者群体的身体力行。如果现代化的中国史学还没有显示出它明确的中心和趋势，那么我们对史学的传统形态的扬弃就缺少足够的判据，因此持一种开放的态度是必要的。至于史学的传统形态能否实现它的现代转化，则和游刃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史学工作者的创造性转化有关。

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由于时间、经历以及专业知识的局

限，本书无法全方位地从具体的历史研究中把握改革开放以来史学理论嬗变的脚步，只能以史学理论为主。另外由于和史学界的高层接触不多，对史学运作机制方面的材料的收集无法全面，史学工作者的私人学术关系也不便展开调查。这些都有可能影响研究深度。比较薄弱的环节有两个：其一是西学东渐。西学东渐对中国史学产生的影响是跨学科性质的。文化人类学、社会学等方面的西学著作往往是整个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共同拥有的。一些非史学领域的西学著作对中国史学观念的改造同样是巨大的。比如库恩的“范式”概念对当代史学工作者的影响就不容忽视。如何勾勒这方面的西学影响，将是本书日后努力加强的一个方向。其二是当代史学的传统形态，对这个问题本书进行了不全面的理论论述，尚缺乏足够的实证研究。从学术史的角度去系统研究中国古代史学的运作方式，比如经史关系的处理、史学家的思维方式等等，然后再比照当代史学，也许我们就可以在认识上超越“教条主义”、“左”、“学风”这些表面的理由。这也是本书感兴趣但尚未来得及做的工作。

一点希望。由于本书的基本定位不在综述方面，而是寻找“变”、突出“变”，因此希望对本书不要怀有求全责备的心理。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当代大陆史学理论研究的史与思	(1)
第一节 现状与问题	(1)
第二节 当代史学研究的理论	(7)
第二章 大陆史学理论嬗变的背景 ——社会转型与现代化	(47)
第一节 中国特色的现代化	(47)
第二节 经济体制改革与思想观念的变化	(53)
第三节 与史学嬗变有关的几点参考性标尺	(60)
第三章 改革开放以来的大陆史学理论嬗变	(79)
第一节 当代大陆史学理论嬗变的主要特点	(79)
第二节 拨乱反正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再认识 和新发展	(98)
第三节 改革开放以来的西学东渐	(118)
第四节 史学领域内多元观念的催发	(130)
第五节 史学自我意识的萌芽	(160)
附 录	(200)
参考文献	(215)
后 记	(240)

第一章 当代大陆史学理论研究的史与思

第一节 现状与问题

改革开放的历史尚处在不断发展之中，一切都要通过进一步的发展才能逐渐露出它的本质。综观当代史学工作者对当代史学的研究，当代史学的研究对象化有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很少有学者有意识地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把握正在发生的历史。当代史学工作者作为当代史学的建设者、参与者，很难置身事外。他们对当代史学的关注，常常具有过多的个人感情色彩，加之史学主导理论有意识地把史学的发展和许多外在的因素挂靠起来，比如捍卫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史学研究的指导作用，史学研究要密切联系实际等等，于是，史学自身的发展轨迹不能不受到这些外来因素的影响。“维护”与“研究”的角度常常混在一起。对当代大陆史学理论的研究，本文希冀的是一种学术史的研究角度。学术史意义上的研究是以学科自主为立场，要求研究摆脱诸多非学术性因素的束缚，比如不纠缠于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抽象争论，不考虑个人的名利得失。只要史学研究者意识这一点，他们所批评和肯定的范围就会扩大许多，他们所作的研究也就更具有学术史意义。20 世纪 80 年代有一些对史学发展的思考，比如当时的一些史学反

思,以及关于史学危机和史学改革的讨论文章,它们置身局内,具有明显的倾向性,它们的价值主要是帮助我们找到一些史学存在的症结,而对这些症结的说明,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当代史学理论作为学术研究对象本身具有不成熟性。首先,当代史学发展的时期是我国社会转型的时期。新形势、新问题、新思想层出不穷,分歧取代了统一并且进一步扩大;结论不再单一肯定,而是有待于时间的检验。学术总结缺乏完善的参照系,研究的不确定性逐步扩大。其次,当代史学发展的时段实在短得不足以成为一个单独的研究对象。即便到了20世纪末的学术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史学也大多是作为整个20世纪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被注意和研究的。短暂的发展时段使当代史学理论作为研究对象缺乏独立地位。学术研究成果可以反映出这一点。

在学术著作方面,先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出了两部总结性的著作,^①对建国以来的史学进行了综述性的总结,其价值在于明晰了史学发展的线索,同时使史料系统化了。在此之后又出现两部各具特色的著作。^②其一是传记式的学术史著作,向我们展现了个人视野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学发展史,它触及到一些较深层次的问题,比如文革史学、新时期自然科学方法论的引用等。另一部问题意识很强,用思潮迭变的形式论述了共和国史学。对一些具有学术成见的问题,比如改革开放之初“回到乾嘉去”的学术现象,20世纪末期又出现了两部回顾百年史学的

① 周朝民编:《中国史学四十年》,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

肖黎编:《中国历史学四十年》,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

② 张艳国编:《史学家自述——我的史学观》,武汉:武汉出版社,1994年。

王学典著:《二十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主潮》,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6年。

著作,^①一部以继承具体学科研究成果为主,一部以概括研究为主。从学术著作研究的整体上看,改革开放以来的史学偏于一隅,迄今为止,仅有一部以改革开放史学为单独研究对象的学术著作^②。

在学术论文方面,研究状况要比学术著作好一些,起步也早一些。在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有学者对一些史学的具体问题进行系统的归纳。^③但是也同样因为当代史学发展过程的短暂,这方面的研究很少,整体性的研究更是缺乏。20世纪90年代以后,对当代史学的研究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一个表现是以当代史学为关键词的学术文章日益增多;另一个表现是在研究视角上,当代史学逐渐从一个亲历过程转变为学术研究的对象。导致变化的一个原因是作为群体的学科意识的闪现。20世纪80年代末期出现的史学危机的呼声,使史学工作者对史学自身问题的关注具有了群体性,在相互交流中,史学工作者能就史学存在的主要问题达成共识,相应地,他们解决问题的见解就不仅仅是个人性质的,学科意识也渗透其中。另一个相关的原因是90年代学术史研究的兴起,为研究当代史学提供了学术自身发展的视角和研究的方法。还有一个原因也在推波助澜:那就是建国40周年

① 刘新成编:《历史学百年》,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

曹家齐著:《顿挫中嬗变——20世纪的中国历史学》,北京:西苑出版社,2000年。

② 邹兆辰、江涓、邓京力等编著:《新时期中国史学思潮》,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1年。

③ 蒋大椿:《史学领域理论研究的基本取向(1984-1986)》,世界史研究动态,1987年第8期。

罗宝轩:《1979年以来关于史学理论和史学方法论探讨的概述》(一)(二)(三),《历史教学》,1986年第7/8/9期。

谢保成:《建国以来史学理论和史学方法问题讨论简介》,中国史学会《中国历史学年鉴》编辑部编:《中国历史学年鉴1987》,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

的和世纪末的学术回顾。有历史研究的总结,^①也有史学研究的总结。涉及到史学研究的主要有两类:

一类是有组织的,代表史学发展主导意见的学术总结。^②1992年,《史学理论研究》就20世纪中国史学,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回顾和展望式的讨论;1993年第八届全国史学理论讨论会则集中反思和总结马克思主义史学;^③1995年召开了“历史学在新时期面临的挑战与机遇”座谈会;^④1997年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召开学术讨论会讨论20世纪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地位问题;^⑤1997-1998年《历史研究》也推出回顾与总结的专栏,发表了一些有影响、有地位的史学工作者的文章;^⑥2000年举办了“学术百年论坛,新世纪讲学”历史学研讨会,对20世纪历史学进行回顾和展望。^⑦这些学术行为共同的特点是力图对史学研究的未来发展路向施加有力的影响。回顾与展望式的研究思路逐渐占据学术期刊的主流位置,与这种有组织的学术引导关系很大。

另一类是一些个人的见解。形式灵活,重点各异。其中出现

① 范围相当广泛,既有具体学科,比如中国近代史、世界史,也有专题史,比如社会史、文化史,详情见附录一。

② 它以百年史学为主体,而对当代史学的总结,目前在有组织的学术行为中,比重很小。

③ 张艳国:《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反思与前瞻:第八届全国史学理论讨论会观点综述》,《江汉论坛》,1993年第11期。

④ 《贴近现实繁荣史学:“历史学在新时期面临的挑战与机遇”座谈会纪要》,《光明日报》,1995年5月29日第5版。

⑤ 许殿才:《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历史地位学术讨论会纪要》,《史学史研究》,1997年第3期。

⑥ 林甘泉:《新的起点:世纪之交的中国历史学》,《历史研究》,1997年第4期。

戴逸:《世纪之交中国历史学的回顾与展望》,《历史研究》,1998年第1期。

⑦ 焦雅君、刘伟:《百年历史学研究:回顾与展望:“学术百年论坛,新世纪讲学”历史学研讨会综述》,《北京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

了一些以改革开放以来为时间单位的研究成果。^① 尽管它们在世纪学术总结中所占比重很小，但展示了当代史学日益成为一个单

① 吴少琨、郑福才、郑先兴：《近20年来史家情感、性格或历史感研究综述》，《洛阳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

于沛：《史学理论研究与新时期中国史学的复兴》，《学习与探索》，2000年第1期。

侯云灏：《20世纪80年代中国史学的基本走向》，《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1期。

蒋大椿：《近五十年来来的史学理论研究》，《安徽大学学报》，1999年第6期。

钱茂伟：《近二十年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发展轨迹》，《史学月刊》，1999年第6期。

朱发建：《从“陈寅恪”热看九十年代的中国史学》，《湖南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6期。

邓京力：《新时期拨乱反正史学思潮初探》，《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

陈启能：《近20年中国历史学的新发展》，《世界历史》，1999年第3期。

蒋大椿：《改革开放以来史学领域理论研究》，《史学理论研究》，1999年第3期。

陈虎：《20年史学的反思及其发展前瞻》，《文史哲》，1999年第3期。

张广智：《近二十年来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史学史研究》，1998年第4期。

王家范：《十年史学的动与静》，《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3期。

雷戈：《社会转型与史学变革》，《学术月刊》，1997年第1期。

仲伟民：《新时期以来史学理论体系研究述评》，《江汉论坛》，1995年第5期。

于沛：《转型中的历史科学》，《世界历史》，1994年第5期

张芝联：《当代中国史学的成就与困惑》，《史学理论研究》，1994年第4期。

王学典：《新时期史学思潮的演变》，《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第2期。

张广智：《我国新时期的美国史学史研究》，《世界史研究动态》，1993年第11期。

赵吉惠：《80年代中国历史认识论研究的突破与困惑》，《学术研究》，1993年第6期。

赵吉惠：《当代历史认识论的反省与重建》，《历史研究》，1993年第4期。

胡逢祥：《新时期历史学建设刍议：简谈高校史学专业的改革和调整》，《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4期。

朱政惠：《挽狂澜而奋斗——当代中国史学思潮述评》，《探索与争鸣》，1993年第4期。

周朝民：《新时期反思史学简论》，《探索与争鸣》，1992年第2期。

张广智：《我国新时期的西方史学研究》，《复旦学报》，1992年第1期。